

# 日本对东盟的环境外交

董 亮

【摘 要】由于地理位置、资源型经济、脆弱的生物多样性及人口贫困等因素，东盟国家易受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负面影响。因此，东盟具有强烈的环境合作意愿。日本对东盟国家的环境外交以非约束原则为指导，形成了灵活的环境合作和激励机制，资金构成多元化。这些符合东盟国家的特点，十分具有针对性。当前，日本对东盟的环境外交机制包括东盟 + 3 环境部长会议、东亚峰会环境部长会议以及日本—东盟环境合作对话。整体上，日本对东盟所推行的环境合作是以“生活质量伙伴”为核心，并为其整体的外交战略布局服务。这些环境合作主要集中在城市、低碳发展及空气污染治理等方面。日本的环境外交彰显其环境援助与项目的优势，形成了东盟与日本合作的依赖关系。

【关键词】日本；东盟；环境外交；机制；影响

【中图分类号】D83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6099 (2017) 02 - 0073 - 15

## 引 言

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与东盟的关系，进而在地缘上牵制中国。目前，日本是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并正在加强与东盟区域的互联互通，打造全面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逐步推进日本—东盟战略经济合作（2012—2020 年）战略进程。在环境领域，日本采用针对东盟特点的环境外交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日本如何在东盟推进其环境外交进程。一般而言，环境外

---

【作者简介】董亮，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气候变化与亚太水资源安全治理研究”（16BGJ057）。

交通通常是指各国围绕全球或区域环境治理展开的双边或多边外交行为，其参与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环境外交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产物，实际上是围绕环境合作所展开的国际会议与谈判等活动的总称。

劳伦斯·苏斯金德 (Lawrence E. Susskind) 等学者认为，环境外交主要是指以达成环境协定为目的的谈判过程。在环境外交 20 多年的演变过程中，这一概念已经在国际关系学科内得到了学理上的不断拓展，主要包括三个研究领域：一是环境治理：通过对环境合作制度的分析，理解国际或区域的合作进程；二是环境安全：通过外交机制解决冷战后的资源稀缺性问题及其潜在的暴力冲突；三是环境和平建设：由环境问题诱发暴力冲突后所进行的恢复重建过程<sup>①</sup>。

由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国际规范意义，环境外交的进程可能是国家间利益与环境认知趋同的过程。在这一领域，国家行为体、国际机构和其他行为体达成了日益繁多的双边、区域和全球协议与安排。英国学者巴斯顿 (R. P. Barston) 认为环境外交具有四个构成部分：合作机制、主要行为体、进程以及某种形式的协议<sup>②</sup>。可以说，环境外交是建立环境治理制度和协定的有效手段<sup>③</sup>。以区域合作为形式的环境外交，已成为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动力之一。与其他领域的外交一样，环境外交的实质也是通过外交手段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sup>④</sup>。

## 一 日本对东盟环境外交的相关文献

目前，既有文献表明，日本具有推动区域环境外交的强烈政治意愿与动力。罗兰·麦多克 (Rowland T. Maddock) 认为，日本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具有充当环境领导的意愿，其一，日本具有极强的环境保护意识，其二，日本在环境保护技术创新上也十分活跃。由于意识到国际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本较早就提出了环境外交的概念，环境合作及其影响也成为日本的外交资源之一<sup>⑤</sup>。松冈顺吉 (Shunji Matsuoka) 指出在区域环境治理中，日本更加偏好灵活、松散的

---

① Lawrence E. Susskind & Saleem H. Ali,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Negotiating More Effective Global Agreemen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6.

② R. P. Barston, *Modern Diplomacy*, London: Routledge, 2014, p. 183.

③ Radoslav S. Dimitrov,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Paul G. Harris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4, p. 259.

④ 参见张海滨《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⑤ Shunji Matsuoka, "Japan's Asian Strategy: Japan's Asian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a Soft Power of the 21st Century", *Public Policy Review*, Vol. 10, No. 1, 2014, pp. 189 - 226.

合作机制。同时,日本也十分重视东盟的区域合作框架<sup>①</sup>。田中胜等日本学者认为,最近十年,东盟与日本不断深化、细化区域环境合作,并在东亚区域内达成了具有标志性的合作成果。可以说,日本对东盟区域环境外交已经成为地区整体战略中的重要一环<sup>②</sup>。

国内学界也有一些关于日本对东盟环境外交的研究。吕耀东认为日本环境外交顺应了全球环境保护发展趋势。日本通过参与和倡导区域环境对话与合作确立环境外交上的主导权。这种区域环境外交的价值在于它是实现日本大国化战略的一种工具<sup>③</sup>。黄昌朝认为日本在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建设、经济保障和技术支持方面起着领导性作用。然而,区域认知共同体的缺失制约着日本成为真正的区域环境治理的领导者。他的分析侧重于日本的成本和收益视角<sup>④</sup>。屈彩云认为日本环境政府援助(ODA)是国际绿色援助领域的重要现象。政府援助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和手段,已经在日本的环境外交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sup>⑤</sup>。周英指出了日本多元行为体参与东亚地区的环境外交的特点,并从日本环境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官僚机构组成的决策层,科学家群体和日本企业组成的中间层,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和日本国民等三个层面出发,对东亚酸沉降监测网(EANET)进行了分析<sup>⑥</sup>。

总之,国内外学界对日本的环境外交战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和阐释,但关于日本对东盟推进环境外交的方式与做法尚未有进一步的研究与深入分析。

## 二 日本对东盟环境外交的动力与基本特点

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大规模有效的环境治理为日本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技  
术资源。20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谋求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充当领导角色。进入21世纪,日本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来发展其亚洲环境战略,以施加其在全

① Shunji Matsuoka, "Japan's Asian Strategy: Japan's Asian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a Soft Power of the 21st Century", *Public Policy Review*, Vol. 10, No. 1, 2014, p. 219.

② Masaru Tanaka & Shigeatsu Hatakeyama, "Towards Reframing the Spirit of ASEAN Environmentalism: Insights from Japan's COHOO Experience and Studies",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2016 - 5. <https://ideas.repec.org/p/era/wpaper/dp-2016-05.html>

③ 吕耀东 《试析日本的环境外交理念及取向——以亚太环境会议机制为中心》,《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

④ 黄昌朝 《日本在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分析》,《日本学刊》2013年第6期。

⑤ 屈彩云 《宏观与微观视角下的日本环境 ODA 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3期。

⑥ 周英 《东亚环境治理中的日本主体因素》,《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4期。

球及区域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影响。

### （一）日本与东盟的环境合作动力

毫无疑问，日本具备在亚洲开展环境外交所需要的相应条件和能力。整体而言，日本开展与东盟的环境外交，主要基于三个因素的考虑。

第一，环境外交在日本整体外交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日本的环境外交已经成为其亚洲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对日本而言，与东盟的区域环境合作是亚洲整体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日本亚洲环境战略与其安全战略、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和社会文化战略密切相关，而且日本一直比较重视更大范围的亚洲环境治理，不想单单局限在东北亚地区。此外，日本偏好灵活、松散的合作机制，这更符合东盟国家的特点。当然，日本重视东盟的地方区域框架也是基于日本对亚洲区域合作的宏大设想逐步展开的<sup>①</sup>。

第二，在普世价值上，对东盟的环境外交有助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声望。为了避免东盟与日本在价值观和规范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冲突，加强道义合法性和提倡“普世价值”成为日本与东盟加深环境关系的发展方向<sup>②</sup>。日本对东盟的环境外交并非完全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而是更多地体现东盟区域的利益。在此种情况下所取得的效果，进一步增进了日本在东盟地区的政治影响和民众好感。

第三，日本在东南亚推行环境外交也有防御性考虑。很多环境问题具有跨界的特点，日本也难逃环境问题对本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日本通过在东盟的投资，转移本国污染性企业，更为有效地改善自身的环境质量。可以说，无论出于政治、经济、环境利益考虑，日本都不会放弃东盟环境合作项目平台所提供的合作机会。

而对于东盟而言，通过区域环境合作解决其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问题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方面，东南亚每年都发生跨境烟霾污染问题，这已经成为东南亚面临的首要环境问题。2013 年 6 月，印尼苏门答腊岛为了清出进行耕种的土地而火烧森林（“烧芭”）的活动，引起了大范围的烟霾扩散。大火引起的浓烟飘至邻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影响范围直抵泰国南部。2015 年，印度尼西亚林火再次引发严重的跨国境烟霾，殃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其严重程度甚至引起联合国的关注<sup>③</sup>。另一方面，由于地处沿海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及资源型经济，东

① Shunji Matsuoka, “Japan’s Asian Strategy: Japan’s Asian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a Soft Power of the 21st Century”, *Public Policy Review*, Vol. 10, No. 1, 2014, p. 219.

② Oba Mie, “Challenges to the New ASEAN-Japan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Regional Circumstances”, *Diplomacy*, No. 20, Mar 26, 2014, <http://www.japanpolicyforum.jp/archives/diplomacy/pt20140326014352.html>

③ 程晓勇 《东南亚国家跨境烟霾治理评析》，《东南亚研究》2015 年第 3 期。

盟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增加了东盟穷困人口的脆弱性。由于地质和地理因素的影响,该地区也是世界上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海平面上升、火山爆发、干旱、热浪和海啸等事件在东盟地区变得更加日益严重<sup>①</sup>。

一些学者,如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也认为,东盟在实现2030年政治安全共同体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着跨境污染、气候变化等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深刻影响着区域发展的宏大计划<sup>②</sup>。

总之,东盟在环境治理中缺乏资金、技术和治理经验,需要域外先进国家的援助。东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一些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因此,在环境保护方面资金与技术上的缺失无法应对环境污染的恶化。可以说,东盟国家迫切需要通过环境合作的方式帮助其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 (二) 日本对东盟环境外交的整体特点

根据日本外务省文件,在2015年东盟与日本外长会议上,双方已经将气候变化合作与减灾列为重点合作领域之一<sup>③</sup>。“生活质量伙伴”作为《东盟—日本友好合作愿景声明》(the Vision Statement on ASEAN-Japa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的第三根支柱,其内容分成灾害管理、卫生医疗和环境保护等三个方面<sup>④</sup>。这说明环境外交在日本对东盟政策中具有重要地位。

其中,灾害管理与环境保护具有极强的相关性:第一,在灾害管理上,东盟是一个自然灾害(包括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多发的区域,同日本进行合作,有助于东盟国家获得先进的灾害管理与防灾领域的知识和技术。日本也表示要帮助东盟建立更强的灾害应对能力以及高质量的灾害管理基础设施。第二,在环境保护上,日本通过运用环境保护经验和技能,协助东盟在现有经济发展阶段应对污染问题,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从主要行为体关系、合作进程以及模式的角度,可以发现日本对东盟的环境

① Raman Letchumanan, "Climate Change: Is Southeast Asia up to the Challenge?: Is There an ASEAN Policy on Climate Change?", *IDEAS Reports*, 2010, [http://eprints.lse.ac.uk/43572/1/Climate%20change\\_is%20there%20an%20ASEAN%20policy%20isero%29.pdf](http://eprints.lse.ac.uk/43572/1/Climate%20change_is%20there%20an%20ASEAN%20policy%20isero%29.pdf), pp. 50-62

② Amitav Acharya, "ASEAN 2030: Challenges of Building a Matur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unity", 2013, ADBI Working Paper, No. 441, pp. 12-17.

③ "Japan-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2015-08-05, [http://www.mofa.go.jp/a\\_o/tp/page3e\\_000360.html](http://www.mofa.go.jp/a_o/tp/page3e_000360.html)

④ "Japan-ASEA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Shared Vision, Shared Identity, Shared Futur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5, <http://www.asean.emb-japan.go.jp/documents/20150402%20pamphlet.pdf>, p. 7

外交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行为体关系上看,日本基本主导了与东盟的环境合作。一方面,东盟区域环境机制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东盟的区域治理以“东盟方式”为标志,但这种地区主义是一种软性地区主义。因此,这种超国家行为体并不能有效地应对区域内的环境问题。例如在空气污染治理上,虽然东盟国家就确定跨境烟霾治理的法律框架进行了多轮协商与谈判,但雾霾问题一直未能取得明显成效。东盟方式意味着东盟各国不干涉其他成员国的内政,在解决地区问题时注重协商一致的原则<sup>①</sup>。而以印尼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担心在烟霾问题上制定的法律会在执行和履约等方面存在侵蚀国家主权的风险,导致这一问题无法解决<sup>②</sup>。坚持“东盟方式”的环境合作价值观,其结果往往是坚持国家利益高于区域利益。可以说,在环境治理上,东盟难以调和的内部立场,加之缺乏资金、技术支持,影响了区域环境治理的成效。

而日本是具有国际一流的防治环境污染技术,并且在环境政策、环境管理等方面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这种客观上的输出与输入的对接需求及其不对称性有利于两者形成环境外交关系。而且,目前日本推动的城市环境合作是一种点对点的方式,增强了东盟国家参与环境合作获得支持的意愿与行动。在支持力度方面,日本对东盟国家也有侧重,其中在 2006 年至 2009 年间,越南、印尼连续 4 年进入日本环境受援国前 5 名之列<sup>③</sup>。

第二,在合作进程上,日本从环境中心建设转向城市项目,并兼顾环境信息的分享以形成共同的环境认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推出了环境中心和环境援助的合作方式。进入 2000 年后,日本开始推广城市项目,并且这一模式已经在东盟区域内形成了一个城市合作网络<sup>④</sup>。通过这种合作方式,日本促进了与东盟各国的环保部门和城市的关系。同时,日本的环境外交以认知趋同作为辅助手段。环境“认知共同体”有助于形成共同的理念、信念、合法性标准和政策

---

① David Seth Jones, “ASEAN Initiatives to Combat Haze Pollution: an Assessmen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Public Policy-making”,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2, No. 2, 2004, pp. 59–77.

② Vinod K. Aggarwal & Jonathan T. Chow, “The Perils of Consensus: how ASEAN’s Meta-Regime Undermines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7, No. 2, 2010, pp. 262–290.

③ 屈彩云 《经济政治化: 日本环境援助的战略性推进、诉求及效应》,《日本学刊》2013 年第 6 期。

④ 其中,在印尼进行的区域监测能力建设项目拓展了该国环境中心的功能;泰国的环保中心投入运行后也在培训环境行政官员、制定环境信息及推动环境研究和转让环境监测技术(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规划<sup>①</sup>。共同的认知有助于推进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并通过专业论坛和信息分享形成双方环境合作的共同理念。近年来，日本专家在东盟创建了大量的论坛和信息分享平台，以促使东盟采取与日本相同或相似的环境合作方法。这些日本专家不仅包括科学家，而且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环境倡议组织等，而多种行为体共同参与的对话有助于环境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落实<sup>②</sup>。在日本创立并主导的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络（EANET）中，东盟是积极的参与者<sup>③</sup>。

第三，在合作模式上，日本与东盟的环境合作具有比较天然的契合度。这是因为日本和东盟各国均倾向于采用非约束力方式进行合作。同时，日本通过多元的资金机制和激励手段在东盟地区推动城市合作和低碳发展项目。这种合作方式最大的好处是符合东盟区域治理的整体特点和各国国情，也有助于日本在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

此外，在影响国际合作的条件方面，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界定了四个因素：国家间的经济平等，精英价值观的互补性，多元主义的存在，以及成员国的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sup>④</sup>。从这几个标准来看，日本与东盟的环境合作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可以说，这种合作是日本向东盟输出合作模式、环境资金、技术和信息的过程。这种国际合作中涉及大量的国家间政治互动，有利于整体关系的塑造<sup>⑤</sup>。

总之，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环境合作非常灵活，多边与双边合作相互配合，既兼顾了对外合作战略布局的稳定，也保证了具体环境目标的及时落实。日本对东盟的环境外交战略虚实结合，一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环境合作项目和资金机制，另一方面又在认知塑造、信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sup>⑥</sup>。通过这些方式和手段，日本力求在东盟地区建构符合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治理模式<sup>⑦</sup>。

① 董亮、张海滨 《IPCC 如何影响国际气候谈判：一种基于认知共同体理论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8 期。

② Shunji Matsuoka, "Japan's Asian Strategy: Japan's Asian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a Soft Power of the 21st Century", *Public Policy Review*, Vol. 10, No. 1, 2014, p. 195

③ Ibid., p. 213.

④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556—586 页。

⑤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27, No. 1, 1974, pp. 43—44.

⑥ "Mission of Japan to ASE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www.asean.embjapan.go.jp/home.html>

⑦ 李志斐 《环境安全化路径分析与治理体系构建》，《教学与研究》2011 年第 1 期。

### 三 日本对东盟环境外交的主要机制

当前,日本与东盟国家环境合作的主要机制是两个区域部长会议及一个环境对话:东盟+3 环境部长会议 (ASEAN+3 EMM) 与东亚峰会环境部长会议 (以下简称“EAS-EMM”),以及东盟和日本环境合作对话<sup>①</sup>。然而,本质上,这三个环境合作机制都是对话性的、松散的,合作并不具有国际法意义的约束力。

#### (一) 东亚峰会环境部长会议

东亚峰会环境部长会议<sup>②</sup>是为了跟进 2007 年 11 月在新加坡举办的第三届东亚峰会发表的《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的新加坡宣言》(Singapore Decla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而设立的<sup>③</sup>。第一次会议于 2008 年 10 月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将“环境可持续城市”(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Cities,以下简称“ESC”)作为日本与东盟的优先合作领域<sup>④</sup>。

日本不断增强 EAS EMM 的合作计划,并支持了第 4 届和第 5 届“环境可持续城市高层研讨会”(High Level Seminars o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Cities)、“东盟模范城市计划”(ASEAN Model City Program)等活动。自 2012 年开始,日本邀请东盟各国代表参与每年举办“东亚低碳发展伙伴对话”(East Asia Low Carbon Growth Partnership Dialogue)。由于合作规模的扩大,这一会议召开的频率增加,由两年一届提升为每年召开。

在此机制内,日本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日本不但于 2008 年推广了“清洁亚洲倡议”(Clean Asia Initiative)理念、具体方案和项目,还借助亚洲地区 3R 论坛、环境可持续交通(EST)、水及大气环境措施(WEPA and EANET)以及通过相关网站进行环境教育,并且积极推动各项计划在东盟各国城市的执行<sup>⑤</sup>。在与东盟各国城市的合作中,柬埔寨、缅甸、老挝及越南成为重点对象国。其中,越南在与日本的城市合作中获益最多。不仅诸多城市参加了《东盟环

① “The Japan-ASEAN Dialogue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https://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dialogue/asean\\_j.html](https://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dialogue/asean_j.html)

②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of Korea, <http://eng.me.go.kr/eng/web/index.do?menuId=422>

③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Government of Japan”, <https://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dialogue/easemm.html>

④ Michelle Ann Miller & Tim Bunnell, “Introduction: Problematis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and the Urban in Asia”, *Pacific Affairs*, Vol. 86, No. 4, 2013, pp. 715-729.

⑤ “5th High Level Seminar o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Cities (HLS-ESC)”, <http://environment.asean.org/5th-high-level-seminar-on-environmentally-sustainable-cities-hls-esc/>



境可持续城市模式》项目，而且下龙市（2008 年）、岘港市（2011 年）以及顺化市（2014 年）还荣获了日本设立的“东盟环境可持续城市奖”<sup>①</sup>。

## （二）东盟 + 3 环境部长会议

东盟 + 3 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也是日本积极推进对东盟环境外交的重要平台。在这一框架内，日本不断提出倡议、合作框架和计划，并且与东盟一起建立了日本—东盟一体化基金（JAIF），以支持各类项目的具体实施。这些举措均得到了东盟国家的高度评价和政治信任。

自 2002 年在老挝万象首次召开东盟 + 3 环境部长会议以来，该机制拓展了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与日本的环境合作。其中，在 2014 年的第 13 次东盟 + 3 环境部长会议上，东盟国家要求日本进一步发展与加强环境合作。尤其是泰国、老挝和越南对“东盟环境模范城市计划”所支持的包括人员培训、环境信息分享与环境管理等在内的能力建设表示高度认可。2015 年 10 月 29 日在越南河内召开的第 14 次东盟 + 3 环境部长会议上，日本继续推进“东盟环境模范城市计划”，并提出利用“联合抵换额度机制”（the 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以下简称“JCM”）完成相关扶持政策的细节。同样，随着 2015 年 9 月联合国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日本还提出了与东盟合作实施这一议程的愿望。东盟国家不仅积极响应了日本的倡议，并且要求将这些努力进一步发展下去，东盟各国高度评价“东盟环境模范城市计划”对能力建设的提升<sup>②</sup>。

## （三）日本—东盟环境合作对话

在 2007 年的第 11 届日本—东盟峰会上，日本政府建议启动日本—东盟环境合作对话，以进一步推动与东盟的环境合作。首次日本—东盟环境合作对话于 2008 年 3 月在越南河内举办。此后，日本与东盟国家共举办了 8 次讨论日本—东盟环境合作的会议。

2013 年 9 月 26 日，在印度尼西亚的泗水举办了纪念日本—东盟友好关系 40 周年大会，同时进行了日本—东盟部长级环境对话。日本为东盟提供了相关低碳发展的扶持政策，并将 JCM 作为创建“环境可持续城市”的资金措施<sup>③</sup>。

第 9 次对话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行。这次对话主要为

① “The Second East Asia Summit Environment Ministers Meeting [EAS EMM] / The Ninth ASEAN plus Three Environment Ministers Meeting [ASEAN + 3 EMM]”, [https://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newsletter\\_list.html](https://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newsletter_list.html)

② “ASEAN + 3 Environment Ministers Meeting”, [https://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dialogue/asean\\_3.html](https://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dialogue/asean_3.html)

③ “The Japan-ASEAN Dialogue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https://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dialogue/asean\\_j.html](https://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dialogue/asean_j.html)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巴黎气候大会谈判做准备。此外，日本汇报了前两个年度“东盟环境模范城市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将以下三个目标作为第三年计划的方向：一是基于共同指标的城市环境绩效评估；二是编辑并出版供其他城市参考的资料文件；三是促进其他城市向具备良好环境表现城市学习的机会<sup>①</sup>。

总之，日本通过运用“城市—城市”合作的 JCM 示范项目向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城市提供支持，同时也组织了一些促进交流的环境可持续城市高层研讨会。

## 四 日本参与东盟环境治理的具体内容

为了不断提升在东盟区域内的影响力，日本凭借自身在区域内环境治理的管理和技术优势，在资金、技术支持、培训安排等方面都不断做出承诺。在具体机制上，日本主要通过“清洁亚洲倡议”推动 ESC 倡议。日本政府还承诺继续运用日本—东盟一体化基金进行资助。

### （一）亚洲城市项目作为主要议程

日本积极推动与东盟的城市合作，快速建立环境外交的城市网络（见表 1）。这一合作具有几个特点：第一，东盟城市如能实现长期或短期的目标，便可成为“模范环境可持续城市”。不同目标的设立对东盟城市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第二，日本以具体战略和行动计划支持这些目标的实施。第三，很多东盟高级别官员（如市长等）有力承诺参与该计划，展示了政治上的显著性。第四，东盟城市如在现有可持续城市奖励计划或评级项目中，表现良好，将获得日方经费支持<sup>②</sup>。入选的东盟城市不仅获得经费、技术援助，还会得到日本国际合作署（JICA）、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亚洲清洁空气组织（Clean Air Asia）等机构的支持<sup>③</sup>。

---

① “Japan-ASEAN Dialogue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https://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dialogue/asean\\_j.html](https://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dialogue/asean_j.html)

② “Clean Asia Initiative, Achieving the next stage of growth in Asia with Low-Carbon Development”，*CAI Newsletter*, Vol. 13, MOE Japan, [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3.pdf](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3.pdf), 2015.

③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Japan to Asian Cities”，*CAI Newsletter*, Vol. 10, MOE Japan, [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0.pdf](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0.pdf), 2013.

表 1 日本在东盟推进的亚洲城市项目

国家	模范城市（2011—2012 年度）	模范城市（2014—2015 年度）
柬埔寨	金边，暹粒	金边，菩萨
印度尼西亚	巨港，泗水	巴厘巴板、拉蒙岸、玛琅、唐格朗
老挝	桑怒	琅勃拉邦、桑怒、龙腾
马来西亚	北古晋	
缅甸	仰光	仰光、曼德勒、彬乌伦
菲律宾	帕洛、莱特岛（普林塞萨港）	黎牙实比、圣卡洛斯、仙朝峨
泰国	湄宏顺府、芒格朗、彭世洛	清莱、披集、怕那尼空、乐筭那空
越南	高岭、岘港	大叻、岘港
共计：8 个国家	14 个城市	21 个城市

资料来源：Clean Asia Initiative, “Achieving the Next Stage of Growth in Asia with Low-Carbon Development”, *CAI Newsletter*, Vol. 13, MOE Japan, [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3.pdf](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3.pdf), 2015.

在议题的变化上，2011—2012 年开展了第一年度的合作活动，关注改善固体废物管理、水质、公共卫生、城市绿化及低碳发展问题。在国家行动方面，JAIF 的援助通过每个国家的政府用于加强既有的倡议。2014—2015 年开展了第二年度的合作活动。在柬埔寨、老挝、缅甸以及越南，合作通过该计划提供资金，并通过其他东盟成员国的政府部门和机构进行互助，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ESC 平台，推动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更大的合作。第二年度该项目加强了对东盟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 6 国城市的奖励计划。此外，日本还鼓励地方政府参与对东盟城市的合作之中（见表 2）。

表 2 日本地方政府与东盟地方政府的合作

日本地方政府	受援国地方政府	合作的主要内容
横滨	泰国曼谷	支持曼谷实施关于气候变化的总体规划。
川崎	印度尼西亚万隆	实施低碳城市发展所需的法律和监管框架能力建设。
京都	老挝万象县	分享京都在监管、规划和实施方面的经验，提供环境技术，并支持环境友好的城市发展。

(续上表)

日本地方政府	受援国地方政府	合作的主要内容
大阪	越南胡志明市	支持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计划。
神户	越南建江省	实施有助于保护自然环境和低碳社会发展的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
北九州	印度尼西亚泗水	支持低碳城市规划。
北九州	越南海防	支持发展海防绿色增长计划。
北九州	马来西亚巴西古当	以“北九州模式”、“松下藤泽生态智能街区(SST)模范”以及“ESCO 商业模式”作为蓝图。
神奈川镰仓	柬埔寨暹粒	分享日本地方政府当局关于城市规划、交通以及环境政策的经验。

资料来源: Clean Asia Initiative, “Achieving the Next Stage of Growth in Asia with Low-Carbon Development”, *CAI Newsletter*, Vol. 13, MOE Japan, [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3.pdf](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3.pdf), 2015.

(二) 环境信息分享与低碳亚洲研究网络

日本通过信息交流的手段, 试图建立环境外交的认知共同体, 以推动日本与东盟在气候、环境认知方面趋同<sup>①</sup>。为了促进这些活动, 日本政府倡导并每年举办 ESC 高级别研讨会。

一方面, ESC 高级别研讨会邀请来自各国政府、地方政府、国际机构、援助机构、研究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一道就可持续城市发展进行知识普及、实践经验交流和政策对话, 同时促进该地区重要的 ESC 利益相关者的合作。2010 年到 2014 年间, 参与国从 12 个增加到 15 个, 并且非政府组织与会人数也大幅上升<sup>②</sup>。

另一方面, 日本建立了低碳亚洲研究网络 (LoCARNet), 这一平台有助于政策制定与实施以科学为基础的亚洲低碳发展。它是由日本政府以及全球环境战略机构 (IGES) 2011 年在柬埔寨召开东盟 +3 环境部长会议时提出的。

<sup>①</sup> 关于科学信息的作用, 可参见董亮《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科学评估与政治谈判》,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11 期。

<sup>②</sup> LoCARNet 历次活动的情况, 可参见 [http://lcs-rnet.org/locarnet\\_meetings/](http://lcs-rnet.org/locarnet_meetings/)

2014年,在“东亚低碳增长对话”上,低碳亚洲研究网络正式被批准。自此,这一网络每年在东盟+3环境部长会议上汇报其进展,并通过网络鼓励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及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政策对话。目前,这一平台在日本与东盟的环境合作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日本—东盟共同参与对低碳发展的研究,推动了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对话。低碳亚洲研究已经与多个机构展开了合作,如国家环境研究机构(NIES)、东京大学以及瑞穗研究所(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这种政策对话逐渐提升了东盟各国政策制定者对于研究人员参与国家政策制定重要性的认知,并且已经推动了各国以科学为基础进行的政策制定的相关工作。

第二,平台提升了亚洲支持低碳发展政策的研究能力。该平台在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以及缅甸举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推进能力建设交流。通过在研究者、研究机构、政策制定者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者之间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的方式,提升东盟地区的研究能力。例如,低碳亚洲研究的第3次年会于2014年11月24-26日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在会议期间,参与者们特别针对亚洲紧迫的环境问题进行讨论,如运用观测温室气体卫星验证二氧化碳减排效应,整合减缓与适应(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的城市规划以及支持东盟各国研究方向等<sup>①</sup>。

总之,平台所倡导的在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进行的对话形式,推动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政策规划,鼓励研究成果被纳入决策过程。这一对话也帮助参与者们确认作为主要实施者的商业和工业以及各种其他利益相关者所需要的合作,以确保环境政策的可行性。

### (三) 联合抵换额度的资金机制

由于具备多元的资金机制,对东盟而言,日本的环境外交更具吸引力和控制力。除了传统的政府环境援助之外,目前,日本已经采用联合抵换额度机制,用于评估日本在海外减少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做出的贡献<sup>②</sup>。采用联合抵换额度机制的目的是协调全球低碳技术和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和利用,并对相关进程进行评估。在此机制下,日本企业可利用所掌握的先进环保科技,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换取碳排放权(可抵减自身的温室气体排

<sup>①</sup> Path to a Low-Carbon Asia, “Creating a 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that Aids Leapfrog Development”, *CAI Newsletter*, Vol. 12, MOE Japan, [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2.pdf](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2.pdf), 2014.

<sup>②</sup> Ibid. .

放量,也可出售给日本政府)<sup>①</sup>。这一手段本身也是全球减排灵活机制中的一种,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同时,这种技术转移也使日本获得了重要的环境软实力。

为了加快在亚洲建立可持续低碳社会的进程,日本与东盟已经共同开展了一些可行性研究,评估实施大规模 JCM 项目的方案。目前,这种资金机制主要存在两种形式。

一是为与 JICA 合作实施的项目提供资金等。日本政府为本国金融机构参与的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例如 JICA 所参与的减排项目。通过这种支持,日本可进一步广泛应用最新的低碳技术,这种技术能够高效减排。日本试图帮助东盟城市实施低碳发展。同时,JCM 项目也有望获得抵换额度,同样有助于完成日本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二是亚洲开发银行 (ADB) 提供资金。由于先进的低碳技术会产生额外的费用,在日本环境省的帮助下,亚洲开发银行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填补低碳技术成本与传统技术成本之间的空白,以推广先进技术。2014 年,日本已经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发起了 7 个设备补助项目。截至 2014 年 12 月,日本已经与蒙古、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尔代夫、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哥斯达黎加、帕劳、柬埔寨和墨西哥等 12 个国家签署了 JCM 项目的双边协议<sup>②</sup>。

总之,日本的技术转移已经在东盟城市实现低碳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通过有效运用 JCM 签约国城市之间的合作,建立起多种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框架,并安排若干种不同的资金来源。这种复杂机制的援助能够避免短期的“一次性”合作,并且允许更多可持续的、持久而广泛的发展来实现低碳社会,使东盟国家产生持续合作的愿望。

## 结 语

虽然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问题一直较为突出,架构性的竞争日益明显,但是在复杂的现象背后,以和平、发展与繁荣为目标的东亚地区合作前景依然乐

---

① 《日本政府向联合国工发组织捐款 250 万美元以加强在非洲的低碳科技转让》,联合国新闻网,http://www.un.org/chinese/focus/wen/newsdetails.asp?newsID=5546

② Path to a Low-Carbon Asia, “Creating a 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that Aids Leapfrog Development”, *CAI Newsletter*, Vol. 12, MOE Japan, 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2.pdf, 2014.

观<sup>①</sup>。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后，日本已经开始寻求其亚洲环保战略。尽管日本无法战略性地影响亚洲的环境合作，但是其区域环境合作一直在扩大（从东北亚到东亚和亚太）。在这种前提下，日本对东盟的环境外交开展得踏实、具体，且特点突出。

第一，日本在与东盟的环境合作中虚实结合。在环境外交的议程上，日本不仅关注具体项目及其管理、资金构成，还在认知等领域不断推进。这种城市合作推动了日本与东盟进行本地化的交流，并且强化了地区伙伴关系<sup>②</sup>。这种区域间的多维度互动，推动了东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议程，辅以信息分享的手段有助于东盟与日本环境政策的协同<sup>③</sup>。

第二，日本的亚洲环境战略更加注重功能化、灵活化和激励机制，更加符合东盟地区的特点与期待。日本早期的亚洲环境战略主要是为了支持亚洲国家的环境管理，具体操作是以双边环境合作和环境政府援助（ODA）相结合的模式。无论是日本在泰国、印尼所采取的环境中心方式，还是近期推动的区域城市网络都具有机制灵活的特点，并未强行为东盟国家设置义务，而是以鼓励的方式加以推进。

在2015年国际社会最新通过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仙台减灾框架》（Sendai Framework）和巴黎气候大会（COP21）的国际大背景下，日本在东盟国家开展环境外交工作将获得更多有利的外在条件<sup>④</sup>。因此，未来日本与东盟的环境合作值得进一步从环境政治的理论和现实层面进行深入的跟踪与分析<sup>⑤</sup>。

【责任编辑：陈若华】

① 魏玲 《东亚地区化：困惑与前程》，《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

② Karen M. Siegel, "Can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ean Grugel & Daniel Hammett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713 - 730.

③ "Leapfrog Approach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CAI Newsletter*, Vol. 14, Moe Japan, [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4.pdf](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english/cai/pdf/newsletter_e_vol14.pdf), Jan., 2016.

④ 董亮、张海滨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1期。

⑤ 董亮 《国际环境政治研究的变迁及其根源》，《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5期。

## **The Inside Outweighs the Surface: A Trait of Indonesian Java Culture from the Image of Semar**

ZHU Gangq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Semar , the most significant image of the presentation of Java Wayang , from levels ranging from aesthetics , ideals , ethics and philosophies of Java. Wayang is considered as a fully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Java philosophy. The Javanese seeks the consistency of halus from the inside to the surface , which halus inside means a sensitive mind fulfilling responsibility loyally. The Javanese believe that the inside outweighs the surface. They also believe that individuals a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goodness and the badness , which leads to the ethics of “the major struggle of a human being is the inner struggle of himself”. Thus , a conclusion was drawn—The inside is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surface in Indonesian Java culture.

**【Keywords】** Wayang; Semar; Java Culture; Indonesia

**【Author】** ZHU Gangqin , Associate Professor , Faculty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Guangzhou , China

## **Japan'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Towards the ASEAN**

DONG Liang

**【Abstract】** Due to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 resource-based economy , fragile biodiversity and poverty and other factors , ASEAN is vulnerable to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Thus , ASEAN countries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Japan's environmental cooperative mechanisms for the ASEAN , including the ASEAN + 3 Environment Ministers Meeting , the East Asia Summit Environment Ministers Conference and the Japan-ASEAN Environment Cooperation Dialogue. As the core of the third pillar “quality of life partner” ,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serves the overall strategic layout of Japan , and mainly focuses on city cooperation , low-carbon development , air pollution control , etc. Japan'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to the ASEAN countries , guided by the non-binding principles , forms a flexible cooperative mechanism and a diversified funding structure. This is in line with ASEAN characteristics , and well-targeted. This diplomacy highlights the advantages of Japan's environmental funding and projects , which cause ASEAN dependence.

**【Keywords】** Japan; ASEAN;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Mechanism; Influence



【Author】 DONG Liang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 Beijing , China

**India-Myanmar Relations in the Modi Era: Impetus ,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PENG Ni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 China's influences has been relatively declined while India's presence has been increased in Myanmar , which promoted India's activism aiming to change China's domain in Myanmar. Meanwhile , due to the decreased strategic distrust towards the Sino-Myanmar relations and the promotion of "Look East Policy" , developing economic relations has become a priority in India-Myanmar relations. In addition , India has also strengthened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Myanmar because of the persistent concerns on the border and maritime security.

【Keywords】 India's Myanmar Policy; India-Myanmar Relations; Sino-Myanmar Relations; Regional Structure; Strategic Distrust

【Author】 PENG Nian , Ph. D. Candidate ,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HongKong , China

**Small/Weak Countries' Great Power Balance Diplomacy and the Philippines' Rebalancing Toward China and the U. S.**

SUN Xihui & LV Hong

【Abstract】 Small or weak countries act differently from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 but all countries' foreign policies undoubtedly need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ir power , international posi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fter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 Duterte has quit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China and the U. S. , which also differ from those of the Aquino III administration. In this case , there seems a trend of "approaching-to-China and parting-from-US". As a matter of fact , what the Dutert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doing is to readjust foreign policies from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sides-taking" to "balanced great powers diplomacy" , mainly because of its prior task of development , change of influence of China and the U. S. in the region , and distinct personality of Duterte. Briefly speaking , purposes of the Duterte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turn" include pursuing autonomous policies , obtaining economic assistance from China , and maintaining balanced state of great powers. Furthermore , the US-Phil-